



李彬彬. 致富带头人带贫减贫机制及个体特征的影响[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3, 28(8): 282-295.

LI Binbin. Mechanisms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to help poor households reduce poverty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3, 28(8): 282-295.

DOI: 10.11841/j.issn.1007-4333.2023.08.23

致富带头人带贫减贫机制及个体特征的影响

李彬彬

(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0)

摘要 为探究致富带头人的带贫减贫机制及个体特征的影响, 基于参与式扶贫理论与涓滴理论, 利用 20 个县市致富带头人的调研数据, 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 对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带贫减贫的机制进行了剖析, 检验了个体特征对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效果的差异。研究表明: 致富带头人同时具备“农民”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 具有明显的主动“带富”特征, 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包含了“利己性”与“利他性”的双向特征, 致富带头人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对带动农户增收和脱贫影响显著, 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现有的技能培训和管理培训还需进一步深化。因此, 需要培育多种形式的致富带头人, 扩大乡村经济精英与社会精英范围, 加强致富带头人系统化技能和管理培训, 强化物质支持和精神激励, 提高身份认同, 激发带富潜能。

关键词 致富带头人; 带贫减贫机制; 个体特征; 减贫效果; 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章编号 1007-4333(2023)08-0282-14

文献标志码 A

Mechanisms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to help poor households reduce poverty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LI Binbin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participatory poverty alleviation theory and trickle-down theory, the research data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from 20 counties and cities are used.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 i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driving farmers to reduce poverty and examine the differenc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effect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driving farmers to reduce pover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have the dual identity of "farmer" and "entrepreneur" at the same time, with a clear initiative to "bring wealth" characteristics. Their impact on farmer income includes the "egoism" and "altruism" two-way characteristics. The education level and skill level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driving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there are certain limitations. The existing skills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training need to be further deepened. Therefore, cultivating various forms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rural economic elites and social elit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ystematic skills and management training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are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material support and spiritual motivation, improve identity, stimulate the potential of the rich.

Keywords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mechanisms to help poor households reduce poverty;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收稿日期: 2022-1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3259)

第一作者: 李彬彬(ORCID: 0000-0002-7377-9647), 博士后, 主要从事乡村产业与农村区域发展研究, E-mail: 2106390499@pku.edu.cn

减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在脱贫攻坚中,致富带头人起到了“领头雁”和“火车头”的作用,致富带头人创业培育工程更被列为了精准扶贫的十大工程之一。2018年国家乡村振兴局(原国务院扶贫办)会同财政部等8部委印发了《关于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的指导意见》(国开办发〔2018〕2号),明确了致富带头人的选择条件、选择范围、选择程序和选择数量等,并从选好选准带头人、加大培训力度、完善减贫带贫机制、强化激励措施等方面明确了工作目标。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强调,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坚持扶志扶智相结合,防止政策养懒汉和泛福利化倾向,发挥奋进致富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截至2020年6月,全国共遴选贫困村致富带头人41.4万人,培训近32万人次,村均培育3.2人,领办创办带贫经营主体超过21万个,带动400余万贫困人口参与增收。

用好乡村致富带头人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作为农村基层的重要内生发展活力,致富带头人是连接社会资本与分散农户对接的重要端口,能够发挥基层的凝聚力,完善带贫减贫机制,把贫困群众嵌入产业链条中,持续带动贫困户增收。我国个体的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能力缺陷,导致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出现体制断层,市场竞争能力非常脆弱,在与外界组织发生关系时,只能以个人对群体的方式进行,双方力量的不对称使农民利益极易受到伤害。要想把农民组织起来,这就需要乡村的能人来组织、召集,因此,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培养农民需要的领导者、召集者至关重要。但与此同时,大规模的乡村精英流动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因素对整个社会作用的加强相伴而生,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单向度流失的特征,造成了中国乡村发展的精英人才缺乏的困境,导致了乡村生产发展优势劳动力的匮乏及乡村振兴中坚主体的虚空^[1-2]。乡村致富带头人作为地方新的乡村精英代表,能够利用自身的资金和技术等优势整合乡村发展要素,带动农户参与市场化经营和实现共同发展^[3]。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探究致富带头人的内涵,剖析带动农户减贫的机制,对于提高致富

带头人联农带农效果,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意义。已有研究对于乡村精英与农户减贫的研究在乡村经营与乡村治理、乡村经营的作用及机理等方面有了较为可观的积累^[4]。但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对于致富带头人的概念界定不清,这也导致了无法系统分析致富带头人的联农带农机制。其次,研究方法上看,以案例分析为主,但案例分析由于样本较小,样本代表性存疑,同时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实证分析由于受最小样本量的限制,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样本选择性偏误,但已有的实证研究缺乏对致富带头人特征的细致分解。本研究拟运用参与式扶贫理论和涓滴理论,系统分析致富带头人的联农带农路径,使用2020年全国20个县市的调研数据,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验证了关键个体特征对带贫减贫效果的影响差异,以期明晰致富带头人的内涵与减贫路径,明确影响致富带头人减贫的关键个体特征变量,为优化致富带头人筛选与培训提供科学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致富带头人概念内涵

当前,对致富带头人的概念内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由于研究历史背景的不同和地域经济水平的差异,致富带头人的衡量标准各异,使得致富带头人的概念定义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对致富带头人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对其内涵有清晰准确认识的基础上。

从横向对比来看,与致富带头人相近的概念有乡村精英、乡村能人、领头雁、乡贤乡绅等,部分学者将其看作相同的概念,如部分学者对乡村能人的研究中,将驻村干部、村“两委”、合作社及致富带头人等人员均划分为乡村精英或乡村能人来进行研究^[5]。虽然上述主体在概念内涵方面与致富带头人具有相似之处,但在形成方式与个体属性上存在较大差异。在形成方式上,乡村能人、乡村精英、乡贤乡绅均属于地域属性的概念,主要表征在乡村这一场域内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群体,其概念与西方语境中的“rural elite”也即“乡村的精英”较为相近,是指乡村的社会集团里,极少数能力超凡、各方面出众并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绝大部分的乡村精英为本土或返乡创业的人员,表现为乡村在地化属性,随着资本下乡及外部第一书记等融入乡村,乡村能人或乡村精英的范围被

扩大化。但同时,对致富带头人的文献梳理发现,“土生土长”是致富带头人的必要条件,致富带头人与乡村精英等概念相比具有一定的口语化特征,从而使其有别于一般的乡村精英概念。在个体属性上,乡村精英、乡村能人等概念均符合精英概念的范畴,也即需要包含群体意识(Group consciousness)、共谋(Collusion)、凝聚力(Cohesion)三“C”要素,清楚自己在群体成员的位置,成员之间有信息的交换,在行动时会以群体利益为目标^[6]。在开发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共同推动下,乡村精英、乡村能以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营经验,通过将贫困户纳入自己的经营团体来带动贫困户脱贫,更多地体现出自身的经济属性,乡绅乡贤则借助其在乡村中长期建立起来的社会权威,通过宣传、激励、鼓舞等方式激发贫困户的脱贫内生动力来带动脱贫,更多地表现出自身的社会属性^[7]。致富带头人则包含了致富和带头人两层属性,其中,致富是一个结果表征,体现了其自身应当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及经营及经验,是经济属性的表征,而带头人则体现了一种影响力与号召力,其来源于经济或社会关系,与改革开放初期“先富带动后富”相一致,体现的是共同富裕的思想。从而,致富带头人体现了一种递进的关系,不仅表现出了其经济属性,也表现出了社会属性。

从纵向视角来看,致富带头人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也有所差异,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其核心是围绕“带富”。从最初的乡贤乡绅开始,传统的“乡贤乡绅”指的是村镇中多才多能、有较大作为、享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致仕官员或社会贤达人士。建国之后,传统的“乡贤乡绅”逐渐被村两委成员代替,成为上传下达和实现村民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2年开始,共青团中央进一步明确了致富带头人的内涵边界,致富带头人基本条件是,爱党爱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个人信用记录良好、具有领办村级产业项目实力和能力、有意愿履行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社会责任的本土人才。主要从目前已在贫困村创业人员中选择,包括“村两委”成员、村级后备干部、农村党员、小微企业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家庭农场主、种养业大户和农业产业化企业负责人;在外创办企业、务工有意愿回村创业的本土人才。以四川省2022年评定的致富带头人为例,农村致富带头人的认定范围包括农业技术推广带头人、开拓农产品市场带头人、产业融合发展带头人、增收致富带头人等在各个农业领域起到明显

示范带动作用的人才。四川省将对评定出的农村致富带头人给予优先给予奖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补助、特色产业扶持、创业就业扶持、农村电商扶持、基础要素保障扶持、创业能力培训扶持多种扶持,以及1万元发展资金奖励。

综合来看,致富带头人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主体,具有“致富”和“带头人”属性的群体贯穿了中国乡村发展的整个历程,以“领头雁”的角色引领农民致富和乡村创业,对乡村脱贫与振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时代的致富带头人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村能与乡村精英概念,其身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征:首先,致富带头人同时具备“农民”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以农民企业家或乡村创业者的身份参与乡村发展中,因此,其所从事的行业分布较为广泛,并不局限于传统的乡村产业,也包含了电商销售、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其次,致富带头人具有明显的主动“带富”特征,使其有别于一般的乡村技术能人或乡村精英通过非主观的外部性来表现出带富特征,体现的是一种主动性,通过主动将农户纳入自身经济活动或激发农户内生积极性来带动农户脱贫致富,是“内源式扶贫”的重要动力。

1.2 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的机理

参与式扶贫理论与涓滴理论为理解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阿玛蒂亚·森将贫困视为“权利失效”的结果,“参与式扶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赋权,使社会各种角色在发展进程中平等参与,最终共同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的一种发展观。参与式扶贫理论核心为赋权理论、发展干预理论、分权和治理理论、弱势群体导向,可以缓解农民权利和自由受到剥夺的窘境^[8]。但参与式扶贫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精英俘获的现象,正如帕累托对精英的定义一样,是在一面或多个方面具有特殊优势的社会成员,其产生有着特殊的“内生机制和外力驱使”^[4],在参与式扶贫过程中,由于政府会通过赋权的方式将资金和项目下沉到乡村,精英通过对发展资金、项目信息以及发言权的控制,使得资金与项目偏离了既定目标,乡村精英对扶贫资源的俘获行为造成了贫困农户虽然被纳入合作社或乡村精英的经济体系内,但贫困户仍以“他者”的身份参与其中,无法真正调动村民参与项目的积极性。因此,在参与式扶贫过程中,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增收的过程,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或所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的行为,符合理性人的基本假设。

涓滴理论从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角度解释了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的方式,探究了市场在带动脱贫方面的作用机制,其核心观点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带动贫困阶层群体实现脱贫致富,体现出“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但涓滴理论对贫困户自上而下的福利渗透或惠及,同时意味着农户只能从间接的增长中获益,并不能实现超越其他群体的收入增长。但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在政府的资金和项目的大力支持下,涓滴效应更多体现为“益贫式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涓滴效应”的弱化。

致富带头人在开发式扶贫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我国扶贫的历程经历了兜底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重大转变。开发式扶贫中,虽然较为贫穷的普通村民迫切获得经济增长,但政府难以直接激活这部分群体,必需让更易承接项目的精英群体作为中介,通过“政府—精英—普通村民”链条推动开发式扶贫惠及普通村民群体。开发式扶贫项目下乡无法绕过精英,精准扶贫需要优质的精英,需要完善的乡贤治理^[8]。随着扶贫资源不断流向农村,兜底式扶贫可依据贫富差距排序转移福利至贫困群体,但开发式扶贫中政府则难以直接激活贫穷家庭的生计意愿,须由有能力的乡村能人作中介,形成“政府—能人—贫困户”链条,使项目发挥造血效益,进而惠及贫困户。

致富带头人对农户减贫的影响包含了“利己性”与“利他性”的双向特征。其中,“利己性”表现为以“精英俘获”为特征的资源垄断与农户挤出。致富带头人作为理性的企业家,具有“逐利性”的特征,通过自主经营和“精英俘获”等方式完成生产积累,通过经济或社会层面的“精英俘获”能够获取更多资源,体制性精英、社会精英以及经济精英形成利益联盟,共同垄断资源下乡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村庄公共利益空间^[9-12]“精英俘获”导致财政扶贫项目的目标偏离^[13],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小农户和贫困农户被挤出。致富带头人的“利他性”特征,表现为3个方面,一是为了获取更多扶贫项目或获取相关奖励而主动将贫困农户纳入自身经营体系的主动式利他,致富带头人在组织内分享社会资本的利他行为出于谋取更多合作剩余,寻求认同感以及再生产社会资本的需要,在乡村精英主导的制度模式下,当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成本,从而保障贫困农户的收益^[14-15]。即使在生产积累较弱的情况下,致

富带头人仍然能够选择扶贫项目,将贫困户纳入到产业项目内^[16]。二是出于乡土情结产生的影响,致富带头人多出生于本地,对乡村较为熟悉,其父辈较多生活在乡村内部,在现代发展理念和质朴的乡土情结的推动下,带动农户创业减贫。三是通过涓滴效应产生的外部性影响,表现为非主动性的利他,致富带头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其他农户具有一定的经济辐射,表征为中介效应、示范效应和知识孵化效应。

在主动性利他上,一方面,致富带头人具有朴素的利他主义与公益主义的精神,其经济上的成功使其具有更高的利他意愿,这种意愿与致富带头人的身份无直接关联,来源于个人既定的主观偏好;另一方面,致富带头人需要通过成立合作社、雇佣和土地入股等方式,将农户纳入自身的经营体系内,其联农带农通过三条路径实现。首先,致富带头人实现了农民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发挥了连接市场的中介作用。通过组织和农民专业协会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规模效益,降低了生产销售成本,拓宽了产品销售空间,增强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避免了分散农户之间的无序竞争,提高了农户的议价能力^[17-18];其次,致富带头人扮演着村庄发展推动者、村内矛盾调节者、村落话语塑造者的三重角色,可以通过资源注入、信息传达、制度约束、礼俗规范、榜样与示范的形式,整合成员个体理性的过程中,推动村庄资源整合^[19]。致富带头人作为乡村政策、技术和资金的代表,在推广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新信息和扶持资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示范引导,以“一户带十户、十户带一村、一村带一业”的形式,推动了新技术的传播和从业结构的调整优化^[20]。最后,致富带头人发挥了知识孵化作用,通过“传、帮、带”等形式实现了知识(农业生产技术、销售等)孵化,逐渐培育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21],从而提高了贫困农户的知识技能,这些新孵化成的新型农民有机会进一步转化为新的致富带头人,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增收的路径如图1。

1.3 个体特征对致富带头人减贫效果的影响机理

由前述分析可知,致富带头人具备农民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以农民企业家或乡村创业者的身份参与乡村发展中,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其意愿、行为和效果都会受到主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影响。在乡村情境内,致富带头人与普通农户之间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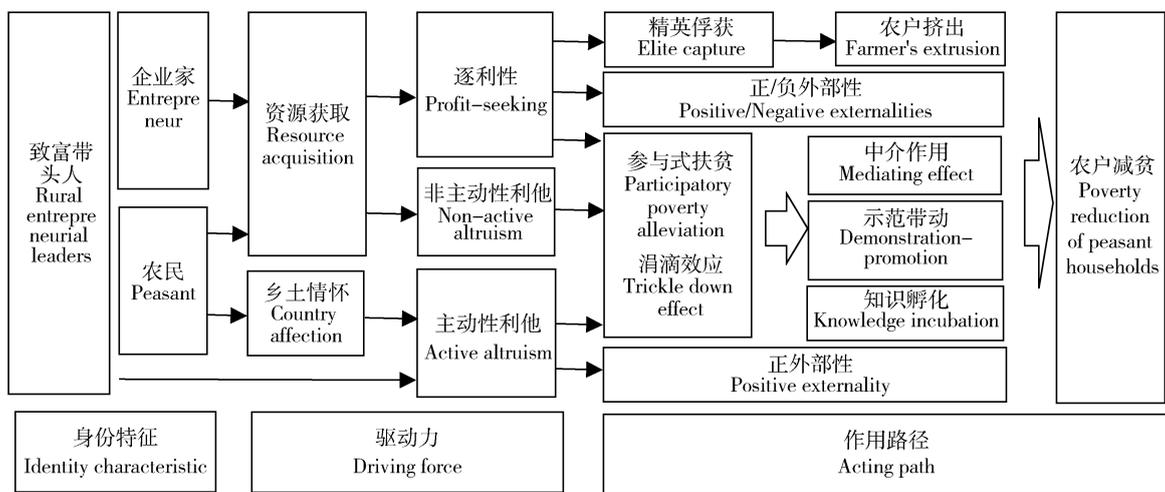


图1 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的路径

Fig. 1 Path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to drive farmers to reduce poverty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是行动逻辑分析的主体,主体的行动动机导向其行动过程并通过行动过程达成利益相关者的期望结果。本研究在姜晓萍等^[22]利

益相关者行动逻辑“动机—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基础上,与梅继霞等^[23]在心理学分析中的个体—情境互动理论相结合,构建如图2所示的理论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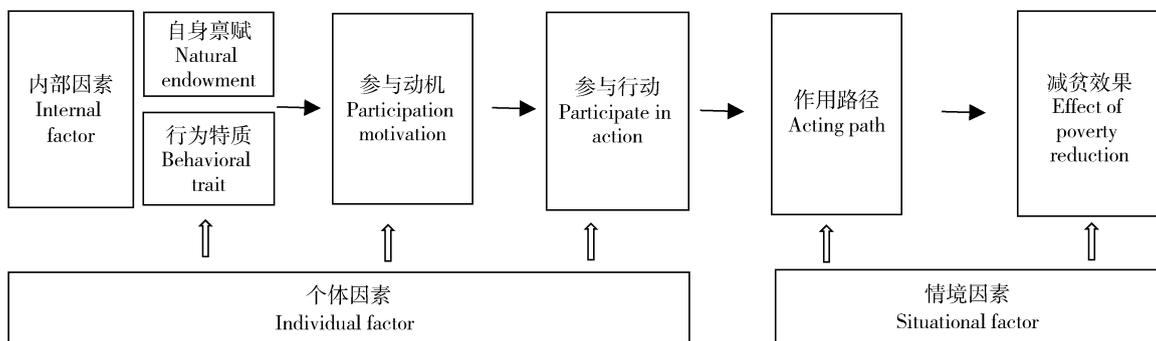


图2 致富带头人参与乡村减贫的理论模型

Fig. 2 Theoretical model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致富带头人的带动脱贫过程,是政治势能和行为特质“双轮驱动”、自身禀赋与激励机制“双重保障”以及场域环境与带动效应“双向加持”的结果^[7]。影响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增收的因素包含了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主要为外部性的激励与场域环境等,外部激励主要为引导性,包含政策的宣传与吸引、精神支持等,场域环境是致富带头人所处的乡村,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外部性的激励与场域环境的地区差异较小。内部因素主要包含致富带头人自身禀赋和行为特质,致富带头人的主体认知和能力素质等因素会影响致富带头人联农带农的作用方向及强度,致富带头人的个体特征将是左右致富带头人减贫的重要调节变量。

不同禀赋与行为特质的致富带头人的内在动机和行动存在显著差异,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影响减贫效果的关键个体特征主要有致富带头人的个人素质、致富带头人从事的行业、致富带头人在村庄中的角色和致富带头人的本地化程度4个方面,这些变量均通过影响其经济参与和体制参与,进而影响到作用路径,从而影响到减贫效果。

1.3.1 致富带头人的个人素质

致富带头人的个人素质包括教育文化程度和乡村产业技能两个方面的因素。一般来说,教育文化程度高的个体具有更快的学习能力和更高的生产管理技能,也能够更快完成乡村社会的原始积累,提高乡村产业的产业化水平,成为个体农户与市场对接

的关键中介。乡村产业技能水平越高的个体,其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示范带动和知识孵化作用更能够显现。

1.3.2 致富带头人从事的行业

致富带头人所从事的行业直接影响到减贫过程中的中介作用。贫困村一般受限于区位因素等客观自然因素,与市场距离较远,面临着供需瓶颈制约。传统的农业种养殖行业以及农产品销售行业由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供需之间的沟通成本和运输成本问题,因此对贫困乡村的产业发展影响较小。在市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从事传统行业的致富带头人的产业规模和市场中介作用较小,减贫带贫的能力有限。电子商务破了乡村原有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界限,实现了贫困地区外部资源的注入与产业供需关系的重塑,在整合乡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同时,实现了乡村的产业集群与协同,能够使更多缺乏生产资料和销售渠道的贫困农户参与到企业生产运营中^[24-25]。

1.3.3 致富带头人在村庄内的角色

由前述致富带头人的分析可知,致富带头人作为土生土长的乡村创业者和农民企业家,具有企业家和农民的双重属性,也即不仅表现出了其经济属性,也表现出了社会属性。其自身应当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及经营及经验,是经济属性的表征,而带头人则体现了一种影响力与号召力,其来源于经济或社会关系。同时,按照韦伯收入、权力与声望“三位一体”的分层理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有物质性、政治性和社会性报酬^[24]。从而,乡村致富带头人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别:掌握村庄主要权力的政治精英、以“能人”“富人”为代表的经济精英、占据资源和信息优势的社会精英。其中,乡村政治精英也即体制精英,是指在村庄具有正式权力的村“两委”干部成员。这种精英作为乡村治理的直接代理人,是连接农户与政府的关键,在“保护型”和“营利型”国家经济人的角色上自如变换。随着乡村的发展,乡村政治精英逐渐成为新形势下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或“能人”带动效应^[26-27]。经济精英主要指乡村企业家、精英大户等经济上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该群体大多是有头脑、有能力的“能人”或者是有资源、有关系的“富人”,利用自身的技术、社会资源和原始资本积累,借助于互联网等新技术提升自身的财富积累,并带动周边农户脱贫致富,同时,富人治村能够显著提

升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降低贫困农户的农业生产成本^[28]。社会精英是在乡村或社区具有较高名望的人,包含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

3种类型的致富带头人的行为特征及资源获取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其联农带农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乡村致富带头人中的政治精英具有更高的利他性特征,是连接政府政策与普通农户的关键。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大力推进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这一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其目的在于确保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29]。且与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不同,政治精英治村更高的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乡村精英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带动农户脱贫的能力。因此,以党员群体为主的政治精英的联农带农意愿和效果也将更为明显。

1.3.4 致富带头人的本地化程度

致富带头人的本地化程度是影响其经济参与和体制参与的另一个关键因素。通过“教育、升学、就业”等制度化途径所实现的劳动力流动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精英群体的萎缩,乡村精英面临着代际更替的困境。在传统的乡村发展和治理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精英群体是乡村内生的。本地的致富带头人因其生长于乡村,且立足乡村经济获得精英地位,在精准了解贫困群体需求,精准选择和培育产业方面更具比较优势,乡村精英通过精准选择产业,敏锐把握新经济模式,在获得自我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在带动贫困户发展方面有较好的表现^[20]。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受到制度结构、经济理性、文化规训、技术变迁、社会转型等因素的影响,构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既要注重从乡村社区内部甄选,也要注重引入原本乡村社区走出去的人才^[30]。畅通“在场”和“不在场”的乡村精英存在一定的必要性,但“不在场”的乡村精英难以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由于与乡村生产和乡村治理存在一定的距离,其非本地化的属性特征表现为一种外部资本导入特征,与本地的融入性不高,进而会影响到减贫效果。

2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课题组2020年的调研数据整理,为了保障样本的代表性,课题组经过前期对

全国贫困村以及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数量的分析,选择贫困村数量及致富带头人数量均较多的安徽、河南、云南、广西、陕西、甘肃、江苏7个省份作为调研省份。在这7省份中选取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数量较多的云南澜沧、寻甸、勐腊、景洪和思茅,广西临桂、恭城、阳朔、灌阳和隆安,新蔡、平舆、固始、新县、泾县、绩溪、铜川、麦积、甘谷、南京20个县市作为调研区县。在选定的20个县市内,对突出的创业致富带头人、创业致富带头人导师,以及县(区)级政府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本研究所有问卷采用自填式问卷,由被调查者自行填写后回收。

经过课题组回收,在剔除无效和部分变量缺失的样本后,共回收得到有效问卷172份。其中,安徽11份,河南21份,云南61份,广西39份,陕西19份,甘肃20份,江苏1份。

2.2 模型设定

2.2.1 基础模型

为了评估致富带头人个体特征对减贫效果的影响,本研究首先构建了如下的线性模型:

$$POV_i = \alpha_0 + \alpha_1 EDU_i + \alpha_2 TEC_i + \alpha_3 ECO_i + \alpha_4 PAR_i + \alpha_5 SCO_i + \sum_{j=1}^n \eta_j z_j + \varepsilon \quad (1)$$

式中:因变量 POV_i 为第 i 个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的效果,本研究主要是农户收入和脱贫比例, EDU_i 为第 i 个致富带头人的教育文化程度, TEC_i 为第 i 个致富带头人的技能水平, ECO_i 为第 i 个致富带头人从事电商或互联网营销情况, PAR_i 为第 i 个致富带头人的党员身份情况, SCO_i 为第 i 个致富带头人的本地化程度, z_j 为控制变量, $\alpha_0, \alpha_1, \alpha_2, \alpha_3, \alpha_4, \alpha_5$ 和 η_j 为系数, ε 为随机误差项。

2.2.2 分位数回归模型

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我国精准扶贫措施减贫效应在整体层面上出现了“边际钝化”现象,也即产业发展带动农户减贫存在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已经得到了大量的文献验证^[31-32]。为了验证这种非线性关系,本研究使用Koenker等^[33]于1978年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刻画在不同分位水平下,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变化趋势,能够解释在不同因变量分位点处自变量的影响差异。构建出如下的分位数回归模型:

$$\beta(\tau) = \min_{\beta(\tau)} \sum_{i=1}^n \rho_{\tau}(POV_i - \beta_0(\tau) + \beta_1(\tau)x_i) \quad (2)$$

式中: x_i 分别为因变量和自变量, $EDU_i, TEC_i, ECO_i, PAR_i$ 和 SCO_i 与前述的基础模型选择变量相一致; τ 为分位数水平, $0 < \tau < 1$; $\beta(\tau)$ 为在第 τ 分位点处的系数,通过最小化绝对离差(LAD)来实现的。

2.3 变量选择

2.3.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衡量农户减贫和增收的关键变量,使用贫困户收入增加量和脱贫比例两个指标衡量致富带头人的减贫效果。

2.3.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影响致富带头人减贫效果的个体特征变量,包含致富带头人的个人素质、致富带头人从事的行业、致富带头人在村庄中的角色、致富带头人的本地化程度4个部分。

其中,个人素质选取教育文化程度和是否有技能两个变量表征;致富带头人从事的行业使用0~1变量表征,与其他行业相比,农村电子商务在促进乡村经济振兴的同时客观上为乡村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起到了形塑与重构乡村共同体的作用^[34],基于此,本研究设定当从事的是电子商务行业时为1,否则为0;致富带头人在村庄中的角色使用是否为政治精英使用政治面貌衡量,当为党员时等于1,否则为0;致富带头人的本地化程度使用0~1变量表征,当在村内时为1,否则为0。

2.3.3 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中,选取个人基本情况、企业运营情况和与农户的利益联结3个方面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其他个人基本情况包含性别和年龄两个变量;企业运营情况采用企业资金来源、企业利润情况、企业申请贷款情况表示;与农户的利益联结使用与农户签订合同的期限表示。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3 结果与分析

3.1 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减贫效果分析

在分析致富带头人的减贫效果时,由于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因此无法使用纵向对比或回归来表征减贫效果,为了更为直观展示减贫和增收效果,利用前述变量赋值,使用箱线图表征其减贫的实际效果特征。由表1可知,带动农户增收的均值为3.35,也即每月收入增加超过1000元,图3的箱线图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省份农户增收的额度区间集中于

表1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类别 Variable class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变量定义 Variable definitio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被解释变量 Explained variable	收入 Income	受访者带动就业的贫困户人员平均每月增加的收入/元 <200=1; ≥200~500元=2; ≥500~1000元=3; ≥1000~2000元=4; ≥2000=5	3.35	1.30
	脱贫比例 Propor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受访者带动的贫困人员最后达到脱贫标准的占比/% <20%=1; ≥20%~50%=2; ≥50%~80%=3; ≥80%~100%=4; 100%=5	3.71	1.41
解释变量 Explaining variable	教育水平 Education level	受访者教育文化程度 未上过学/半文盲=0; 小学=6; 初中=9; 高中或中专=12; 大专或本科=16; 研究生及以上=18	11.39	3.47
	技能水平 Skill level	受访者是否有技能 有技术=1; 没有=0	0.28	0.45
	电商从业 E-commerce profession	受访者是否从事电商或互联网营销 从事=1; 不从事=0	0.12	0.32
	党员身份 Party membership	受访者是否为党员 党员=1; 非党员=0	0.54	0.50
	本地化程度 Degree of localization	受访者本地化程度 村内=1; 非村内=0	0.22	0.41
个人基本情况 Personal profile	年龄 Age	受访者实际年龄/岁	41.41	9.06
	性别 Gender	男性=1; 女性=0	0.88	0.33
企业运营情况 Enterprise operation	个人资金 Personal funds	创业资金是否来源于个人 是=1; 否=0	0.65	0.48
	亲戚借款 Relative loan	创业资金是否来源于亲戚朋友 是=1; 否=0	0.22	0.41
	银行贷款 Bank loan	创业最近是否来源于银行贷款 是=1; 否=0	0.61	0.49
	合作入股 Cooperative investment	创业资金是否来源于合作伙伴入股 是=1; 否=0	0.31	0.46
	企业利润情况 Corporate profit situation	创办的企业(或者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年利润/元 <20万=1; ≥20万~50万=2; ≥50万~100万=3; ≥100万~200万=4; ≥200万~500万=5; ≥500万~1000万=6; ≥1000万=7)	2.23	1.60
	企业申请贷款情况 Enterprises apply for loans	受访者享受小额信贷等金融扶贫支持资金额度/元 <5万=1; ≥5万~10万=2; ≥10~20万=3; ≥20万=4	1.48	1.52
与农户的利益联结 Connect with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合同期限 Contract period	受访者与贫困就业人员签定合同的期限 半年以内=1; ≥半年~1年=2; ≥1~2年=3; ≥2~3年=4; 3年及以上=4	1.21	0.93

第二区间(200~500元)和第四区间(1 000~2 000元)之间,这一增收额度与李群峰等^[3]案例分析中的年度增收20 000多元基本一致。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 131元,月均约1 428元,样本月均增收数值与其

相差不大。由表1可知,带动的贫困人口脱贫比例均值为3.71,也即带动农户脱贫比例高于80%,图3的箱线图可知,绝大部分省份带动的贫困人口脱贫比例主要处于第三区间(50%~80%)和第五区间(100%)之间。综合来看,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脱贫的效果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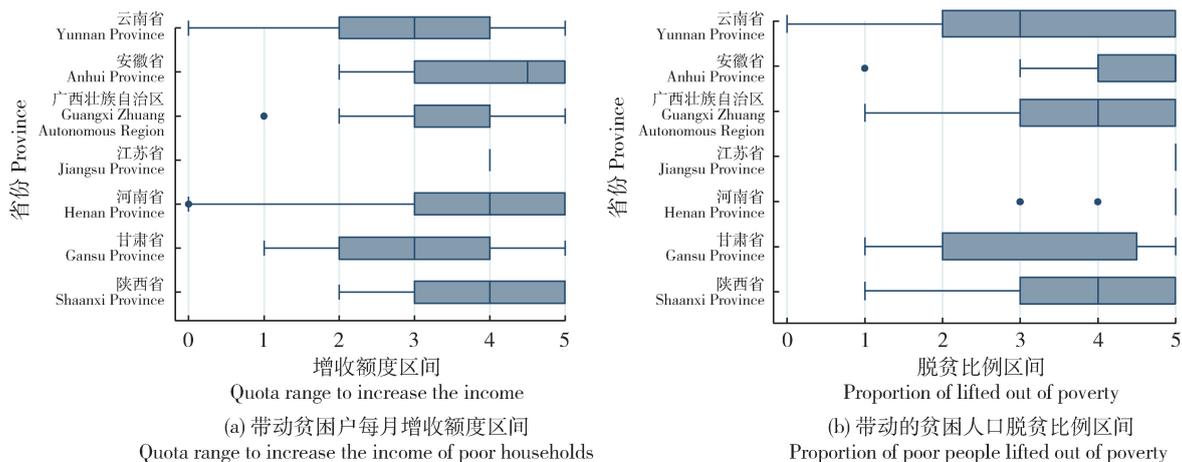


图3 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增收额度与脱贫比例箱线图

Fig. 3 Box-plot of the proportion of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driven by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3.2 致富带头人个体差异对农户减贫影响分析

为探究致富带头人个体特征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本研究使用课题组2020年致富带头人的调研数据,将各主要的个体特征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纳入模型分析中,利用Stata 14.0软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模型进行分析,为了便于分析,结果中并不显示控制变量结果,模型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表2的分析结果分为两个部分,其中,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可以看出,主要解释变量并不显著,对脱贫比例的影响来看,仅有技能水平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正。对不显著部分的系数分析发现,除技能水平和党员身份的系数一致外,教育水平、电商从业与本地化程度对收入和脱贫比例的影响系数均相反,这与常规理解的增收与脱贫比例相同步的理解并不一致,这也表明了线性回归存在过程的失真。

3.2 不同分位数下致富带头人个体差异对农户减贫影响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各解释变量对于不同减贫效果的影响,本研究选取0.10、0.25、0.50、0.75、0.90共5个分位点,分别对于收入与脱贫比例进行分位数回归,得到如下的分析结果。

对收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可知,首先,教育水平在0.10分位点和0.25分位点处正向显著,但随着贫困户收入的增加(也即因变量分位数的提升),教育水平的系数逐渐减小,显著性逐渐降低,在0.50分位点处系数不再显著,在0.75分位点处系数变为了负数,这可能与致富带头人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有关,样本的教育水平平均值为11.39年,也即高中教育水平,在开始经营阶段,教育所带来的信息获取及认知差异会对农户收入有较好增长,但当收入到达一定程度后,教育的影响将面临瓶颈,甚至会由于认知局限,限制进一步增收。其次,本地化程度仅在0.10分位点处正向显著,之后并不显著,且系数符号并不稳定,正负皆有。这可能是由于本地化程度较高的致富带头人在产业发展初期能够更好的组织农户,但后期随着产业的发展和收入的提升,已有的乡土亲情为纽带维系的生产经营关系逐渐弱化。再次,电商从业和技能水平系数均不显著,且系数可能存在负数,这可能是由于电商从业与技能水平更多集中于致富带头人个体身上,技能及电商技术向贫困户传授存在一定门槛。最后,党员身份的系数不显著,但均为正,这也表明了党员的号召力。

对脱贫比例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与收入基本一

表 2 致富带头人个体差异对农户减贫影响

Table 2 Impact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on farmers' poverty reduction

变量 Variable	收入 Income		脱贫比例 Propor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教育水平 Education level	0.031	0.030	-0.003
技能水平 Skill level	0.216	0.223	0.802***	0.262
党员身份 Party membership	0.0492	0.304	0.388	0.357
电商从业 E-commerce profession	-0.270	0.190	0.233	0.223
本地化程度 Degree of localizatio	0.032	0.261	-0.059	0.307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s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R-squared	0.270		0.151	

注：***、** 和 * 分别表示该系数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Note: ***, ** and * indicate the significance at the level of 1%, 5% and 10%,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致,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稳定性。首先,技能水平在 0.25 和 0.50 分位点处正向显著,但系数在逐渐减小,这与技术示范有关,但作用存在边际递减。其次,教育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且系数在逐渐减小。再次,本地化程度的系数基本为负。最后,党员身份的系数不显著,但均为正。

3.3 引入外部培训的进一步分析

由前述分析可知,教育和技能水平是影响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户增收的关键,但由于教育水平的有限性以及技能水平的传播具有一定的门槛,导致带动农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技能培训与企业管理培训作为教育及技能传播的重要补充方式,将对致富带头人的联农带农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将技能培训与企业管理培训纳入模型中,同样采用 1~0 的赋值方法,分别与教育水平及技能水平交叉,以验证教育培训的影响。为了便于分析,仅展示 0.25、0.50 和 0.75 这 3 个分位点处的结果,最终得到如表 4 的回归结果。

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加入技能培训与管理培训变量后,交叉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培训体系尚不健全,尚未表现出对知识和技能传播的有效促进。非交叉项技能培训对农户增收在 0.25 和 0.50 分位点处显著,这表明对农户的技能培训是有效的,但与致富带头人联农带农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强化。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从致富带头人概念内涵来看,致富带头人同时具备“农民”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以农民企业家或乡村创业者的身份参与乡村发展中,其所从事的行业分布较为广泛,并不局限于传统的乡村产业。致富带头人具有明显的主动“带富”特征,通过主动将农户纳入自身经济活动或激发农户内生积极性来带动农户脱贫致富,是“内源式扶贫”的重要动力。

表3 不同分位数下致富带头人个体差异对农户减贫的影响

Table 3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on farmers' poverty reduction under different quantiles

变量 Variable	收入 Income					脱贫比例 Propor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0.10分位	0.25分位	0.50分位	0.75分位	0.90分位	0.10分位	0.25分位	0.50分位	0.75分位	0.90分位
教育水平 Education level	0.110**	0.117**	0.040	-0.013	-0.011	0.007	0.029	-0.023	0.000	-0.000
技能水平 Skill level	0.069	0.259	-0.063	0.282	0.207	0.412	1.371***	1.005**	-0.000	0.000
党员身份 Party membership	0.012	0.233	0.426	0.242	0.132	1.118	0.706	0.091	0.000	0.000
电商从业 E-commerce profession	-0.155	0.211	-0.164	-0.148	-0.167	-0.476	-0.089	0.449	0.000	-0.000
本地化程度 Degree of localization	0.571*	0.720	-0.056	0.093	-0.248	-0.274	-0.451	0.161	-0.000	0.000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s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常数项 Constant term	1.234	0.776	2.641***	4.201***	5.187***	-0.871	0.328	1.887	5.000***	5.000

表 4 加入外部培训交叉项的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4 Results with external training cross-terms were added

变量 Variable	收入 Income			脱贫比例 Propor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0.25 分位点	0.50 分位点	0.75 分位点	0.25 分位点	0.50 分位点	0.75 分位点
教育水平 Education level	0.254	0.219**	0.080	0.126	0.063	0.029
教育水平×技能培训 Education level× Skill training	-0.054	-0.049	-0.038	0.003	-0.025	-0.003
教育水平×管理培训 Education level× Management training	-0.097	-0.022	0.001	-0.142	-0.024	-0.042
技能水平 Skill level	0.034	-0.127	0.094	1.139**	0.915**	0.399*
技能水平×技能培训 Skill level×Skill training	-0.159	-0.590	-0.170	-0.085	0.601	0.055
技能水平×管理培训 Skill level×Management training	1.300	0.914	0.681	-0.649	-0.609	0.124
技能培训 Skill training	0.753	0.726**	0.500	0.544	0.668	0.189
管理培训 Management training	0.742	0.388	0.176	1.655	0.235	0.628
电商从业 E-commerce profession	-0.246	1.692	0.147	1.061	-1.615	-0.171
党员身份 Party membership	-0.253	-0.034	-0.097	-0.017	0.575*	0.350*
本地化水平 Degree of localization	0.194	0.113	-0.124	-0.145	0.034	-0.100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s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已控制 Under control
常数项 Constant term	-0.335	-0.169	2.870**	-1.766	-0.223	2.906***

从致富带头人的联农带农路径来看,致富带头人在开发式扶贫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包含了“利己性”与“利他性”的双向特征,“利己性”表现为以“精英俘获”为特征的资源垄断与农户挤出,“利他性”表现为 3 个方面,一是主动

式利他,二是出于乡土情结产生的推动下,三是通过涓滴效应产生的外部性影响,表征为非主动性的利他,致富带头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其他农户具有一定的经济辐射,表征为中介效应、示范效应和知识孵化效应。

从影响减贫效果的关键个体特征来看,主要有致富带头人的个人素质、致富带头人从事的行业、致富带头人在村庄中的角色和致富带头人的本地化程度4个方面。本研究利用线性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回归,验证了个体特征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教育水平与技能水平是影响致富带头人联农带农的关键,但受限于教育水平不高,技能集中于个体身上,其影响受限。在将技能培训和管理培训纳入模型进一步分析发现,技能培训显著,但交叉项并不显著,也即现有的培训尚未与致富带头人的联农带农有效契合,未能有效解决示范推广和知识孵化中的瓶颈。

本研究虽然得到了有效的结论,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尽管本研究对致富带头人内涵、带贫减贫的机制及个体特征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但受限于调研样本的有限性,未能将个体特征进一步细化分析。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进一步细化调研,将经济学研究与社会心理学研究进行交叉研究,以更好地促进致富带头人带贫减贫。

4.2 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致富带头人数量。应当着力培养多种形式的致富带头人,扩大乡村经济精英与社会精英范围,可积极宣传引导本村外出务工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及参选进入“村两委”。借助“外脑”开发“内脑”,“外脑与内脑”充分联动。

第二,提高致富带头人带富能力,应当加强致富带头人系统化的技能培训与管理培训,提升致富带头人技能水平。可采取邀请上级单位进行系统培训、组织自行培训、远程教育开展个性化学习、生产基地进行现场演练等方式,对致富带头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不断更新致富能人的技术知识,让其带富能力得到不断增强,充分发掘致富带头人的“企业家”的潜能,提高致富带头人的实用性技术与管理能力。

第三,提升致富带头人带富意愿。通过物质支持和精神激励等多种方式的激励手段,提高致富带头人的身份认同,激发致富带头人干事创业热情。对致富带头人实行目标管理、考评激励机制,开展年度创业带富评比活动,对评选出来的典型,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优惠政策,并在资金信贷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刘颖,张英魁,梅少粉.乡村精英人才外流的社会影响与对策[J].学术

- 交流,2010(11):133-138
Liu Y, Zhang Y K, Mei S F. The social impac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brain drain of rural elites[J]. *Academic Exchange*, 2010(11): 133-138 (in Chinese)
- [2] 张英魁,曲翠洁.当前中国乡村精英社会流动的内在机制分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15):19-20
Zhang Y K, Qu C J.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current social mobility of rural elites in China[J].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 2014(15): 19-20 (in Chinese)
- [3] 李群峰,侯宏伟.返乡创业精英如何引领乡村振兴:缘起、机理分析与隐忧[J].世界农业,2021(8):11-16
Li Q F, Hou H W. How to lead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returning entrepreneurial elites: Origin, mechanism analysis and hidden concerns [J]. *World Agriculture*, 2021(8):11-16 (in Chinese)
- [4] 陈军亚.“能人回乡”困境怎么解:基于湖北省71个村庄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J].人民论坛,2019(33):50-53
Chen J Y. How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talented people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in 71 villages in Hubei Province[J]. *People's Forum*, 2019 (33): 50-53 (in Chinese)
- [5] 李裕瑞,常贵蒋,曹丽哲,龙花楼.论乡村能人与乡村发展[J].地理科学进展,2020,39(10):1632-1642
Li Y R, Chang G J, Cao L Z, Long H L. Discussions on rural talents and rural development[J]. *Progress in Geographic Science*, 2020, 39 (10): 1632-1642 (in Chinese)
- [6] Meisel J. *The Myth of the Ruling Class*[M].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8
- [7] 乙咏一.基于扎根理论的致富带头人带动脱贫影响因素研究[D].桂林:桂林理工大学,2022
Yi Y Y.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driven by leaders of getting ri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D]. Guilin: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22 (in Chinese)
- [8] 李金龙,刘巧兰.参与式扶贫:精准脱贫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路径[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8(2):81-88
Li J L, Liu Q L. Participatory poverty alleviation: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governance[J].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48(2): 81-88 (in Chinese)
- [9] 程璆,郑逸芳,许佳贤,陈念东.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困境及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2017(9):56-62
Cheng Q, Zheng Y F, Xu J X, Chen N D. Research on elite capture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in participatory poverty alleviation governance[J]. *Rural Economy*, 2017(9): 56-62 (in Chinese)
- [10] Sheely R. Mobilization, participatory planning institutions, and elite capture: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rural Kenya[J]. *World Development*, 2015, 67: 251-266
- [11] 李祖佩.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J].探索,2012(5):187-192
Li Z P. Elite capture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a village in Central China[J]. *Probe*, 2012(5): 187-192 (in Chinese)
- [12] Cheng X, Wang J. Elite capture, the “follow-up checks” policy, and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Evidence from rural western China [J].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21, 20(4): 880-890
- [13] 邢成举,李小云.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9):109-113
Xing C J, Li X Y. A study on the deviation between elite capture and the goal of fisc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J]. *China Administration*, 2013(9): 109-113 (in Chinese)
- [14] 李佳,郑萍.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走向[J].社会科学,2008(2):82-85
Li J, Zheng Y. Rural elite, social capital and rural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direction[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8(2): 82-85 (in Chinese)
- [15] 孔令刚,孙自铎.乡村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五老会”参与乡村建设案例研究[J].江淮论坛,2013(1):138-142
Kong L G, Sun Z D. The role of rural elites in village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Five Elders” in rural construction[J]. *Jianghuai Forum*, 2013(1): 138-142 (in Chinese)

- [16] 李学楠. 乡村精英机会倾向、生产积累与扶贫绩效:基于豫北Y县13个案例的比较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0(5): 100-109
Li X N. Rural elites' opportunity tendency, production accumul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erformance: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13 cases in Y county, northern Yubei[J]. *Comparis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2020(5): 100-109 (in Chinese)
- [17] 朱璇. 新乡乡村精英在乡村旅游中的形成和作用机制研究:以虎跳峡徒步路线为例[J]. 旅游学刊, 2012, 27(6): 73-78
Zhu X.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and mechanism of new rural economic elites in rural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tiger leaping gorge hiking route [J]. *Journal of Tourism*, 2012, 27(6): 73-78 (in Chinese)
- [18] 杨少波, 田北海. 青年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中的领头雁作用研究:基于对湖北省农村致富带头人的调查[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1): 57-63
Yang S B, Tian B H. Research on the leading role of youth i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 survey based on rural prosperity leaders in Hubei Province[J]. *Chinese Youth Studies*, 2016 (1): 57-63 (in Chinese)
- [19] 马荟, 苏毅清, 王卉, 周立. 从成员个体理性到村社集体理性:乡村精英的作用机制分析:以S省Y村为例[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1(4): 119-128
Ma H, Su Y Q, Wang H, Zhou L. From individual member rationality to village community collective rationality: Analysis of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rural elite: Takes Y Village, S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2021 (4): 119-128 (in Chinese)
- [20] 卢小平. 乡村经济精英参与贫困村产业培育的激励机制:基于广西地区部分县域的观察与思考[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8(4): 78-83
Lu X P.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rural economic elit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dustrial cultivation of poor village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and thinking of some counties in Guangxi[J]. *Research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018(4): 78-83 (in Chinese)
- [21] 王允跃. 青年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中的带头作用研究:基于浙江省舟山市渔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的调查[J]. 教育教学论坛, 2019(19): 224-226
Wang Y Y. Research on the leading role of youth i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young leaders in fishing and rural areas in Zhoushan City, Zhejiang Province [J].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orum*, 2019(19): 224-22 (in Chinese)
- [22] 姜晓萍, 康健. 官僚式外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及其对绩效的影响[J]. 行政论坛, 2019, 26(4): 63-68
Jiang X P, Kang J. Bureaucratic outsourcing: The action logic of stakeholders in the government purchase of public services and its impact on performance[J]. *Administrative Forum*, 2019, 26(4): 63-68 (in Chinese)
- [23] 梅继霞, 彭茜, 李伟. 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及条件:一个多案例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8): 39-48
Mei J X, Peng Q, Li W. The mechanism and conditions of economic elite participation on rur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 multi-case study[J]. *Agricultural Economic Issues*, 2019(8): 39-48 (in Chinese)
- [24] Zhang Y, Long H, Ma L, Tu S S, Li Y R, Ge D Z. Analysis of rur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driven by e-commerce based on the space of flows: The case of Xiaying village in central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8, 93: 196-209
- [25] Jie L, Xian Z, Qi W. Research on mechanism of rural e-commerce promot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luster[C]. In: 2020 *International Signal Processing, Communications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Conference (ISPCEM)*. New York: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2020: 117-120
- [26] 任轶. 政治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角色:一种比较发展的视角[J]. 南京社会科学, 2013(9): 83-89
Ren Y. The role of political elites in village governance: A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J]. *Nanjing Social Sciences*, 2013 (9): 83-89 (in Chinese)
- [27] 陈虹宇, 周俾君. 乡村政治精英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21(3): 105-120
Chen H Y, Zhou Z J. Research on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behavior of rural political elite[J].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conomy*, 2021 (3): 105-120 (in Chinese)
- [28] 张志原, 刘贤春, 王亚华. 富人治村、制度约束与公共物品供给: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1): 66-80
Zhang Z Y, Liu X C, Wang Y H. Rich people govern villages,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public goods supply: Tak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as an example[J]. *China Rural Observation*, 2019(1): 66-80 (in Chinese)
- [29] 易新涛.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生成逻辑、内涵解析和实施指向[J]. 探索, 2020(4): 111-120
Yi X T. The generation logic, connotation analysis and implementation direction of the village party organization secretary “shoulder to shoulder”[J]. *Exploration*, 2020(4): 111-120 (in Chinese)
- [30] 刘生瑛, 梁哲. 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行为逻辑与路径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8(5): 127-137
Liu S Y, Liang Z.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al logic and path of rural elite participating in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 48(5): 127-137 (in Chinese)
- [31] 李晓龙, 陆远权.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减贫效应及非线性特征: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实证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9, 34(12): 67-74
Li X L, Lu Y Q.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and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anel quantile model[J].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Forum*, 2019, 34 (12): 67-74 (in Chinese)
- [32] 张大鹏. 旅游发展能减缓特困地区的贫困吗:来自我国中部集中连片30个贫困县的证据[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8, 33(3): 87-96.
Zhang D P. Can tourism development alleviate poverty in extremely poor areas: Evidence from the 30 contiguous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central China[J].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8, 33 (3): 87-96 (in Chinese)
- [33] Koenker R, Bassett G. Quantile regressions[J]. *Econometrica*, 1978, 46 (1): 33-50
- [34] 陈旭堂, 余国新. 农村电商助推乡村共同体的形塑与重构:基于浙江省遂昌县的实证分析[J]. 探索, 2019(5): 132-140
Chen X T Yu G X. Rural e-commerce boosts the shap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Based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uicha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J]. *Exploration*, 2019(5): 132-140 (in Chinese)

责任编辑:王岩



第一作者简介:李彬彬,管理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产业与区域发展,乡村精英与农村区域发展,乡村认同与乡村重构。参与国家重大社科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北京市社科项目1项。公开发表期刊多篇,包含SSCI,SCI,CSSCI、北大核心等,参编著作2部。